

10(6)/48



鲁迅作品讲话

何家槐 著



魯迅作品講話

何家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9年·武汉

鲁迅作品講話

何家槐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3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开·3 1/2 印张·66,000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10107·128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論述魯迅的文章五篇。內容有：對魯迅生平和創作的概述，和對魯迅的小說、散文詩和散文、雜文以及“故事新編”的分析和評論等。作者結合着魯迅文藝思想的發展，細緻地分析了魯迅的作品。全書深入淺出，簡單明了，容易為讀者接受。對於學習魯迅和學習文藝理論是有一定幫助的。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	1
鲁迅的小说	14
鲁迅的散文诗和散文	38
鲁迅的杂文	57
鲁迅的“故事新编”	80
后记	100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文学事业是很辉煌的，但由于篇幅的关系，现在我只能简单地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前，即他在日本留学时期（1902—1909），先学医，后来又提倡文艺运动，因为他觉得文艺更可以促进人民思想的进步和人民精神的改变，更有力量改造中国的社会和“国民性”。他在1907年写的几篇文章，都是他抱着文化启蒙的目的而写的，其中都透露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当时蓬蓬勃勃的反清革命思想在文化方面的具体表现。本来，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1898—1902），就已具有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和初步的进化论思想，但到这时他的这些思想才更进一步地明确和成熟起来。在“摩罗诗力说”这一篇热情洋溢、力透纸背的论文中，他详尽地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等富有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的诗人，介绍了近代欧洲的进步文艺思想，尖锐地抨击了黑暗的封建统治和没落的封建文化。虽然由于时代条件和他个人认识上的限制（他这时在自然科学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观点上却还是一个进化论者），在他这些时期的论文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着一些錯誤的观点(例如他誤認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反动理論为进步的学說,提出“重个人、非物質”的主張,把路德的宗教改革看成欧洲社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等等,就都是明显的例子),但这些論文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它們不但在了解魯迅早年的思想上占着重要的位置,即对于当时社会思潮的研究上,也是一些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魯迅的創作才能,在他写于1911年末冬天的文言小說“怀旧”中就已經显示出来。但是,真正表现出魯迅的文学天才的,却是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新青年”是一个曾經在“五四”时期革命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的刊物(1915年創刊),它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文化旧礼教,还初步地介紹了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最早的馬克思主义者李大釗同志,就是这个刊物的一个领导人,魯迅則是这个刊物的重要撰稿者和“新青年”这个团体的中坚份子。“狂人日記”是一篇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吃人的旧礼教)的战斗的宣言,是文学革命的第一个辉煌的“实迹”,它标志了魯迅創作事业的起点,也标志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端,意义是特別重大的。

在“狂人日記”发表以后的几年中(1919年3月—1922年10月),魯迅又陸續写了十三篇表现深刻、风格特別的小說,例如“孔乙己”、“藥”、“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傳”、“社戏”等等,以后都收在“呐喊”中,而其中尤以“阿Q正傳”为最著名。这篇小說無論在思想性方面或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一篇現代中国文学史上空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为現代中国文学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这篇小說虽

說以辛亥革命为背景，但它却包含了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寬闊得多和丰富得多的历史內容和历史意义，可以說是一面真实地反映了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鏡子；它不但深刻地揭露、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且也尖銳地諷刺、鞭撻了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醒的部分中国人民（主要是落后的农民）的某种性格弱点——用“精神胜利法”、即所謂“阿Q主义”来自欺欺人的“奴性”。但这种“奴性”并非素以勇敢、勤劳著称的中国人民所原有的性格，而是为野蛮的帝国主义侵略和长期的封建压迫所造成。魯迅一向痛恨封建統治階級对于中国人民的精神奴役，痛心于中国人民的消极落后，不满于中国人民的精神麻痹和不知自觉，因而特別采取了阿Q这么一个流浪性十足的雇农来作这篇小說的典型，决不是偶然的事情。不过，我們必須指出：魯迅对于阿Q这个人物，虽然有所諷刺和鞭撻，但还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当时他已經觉得如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能够更进一步地深入下去，如果能够組織和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阿Q一定会真正地参加革命，結局也决不会是“大团圆”式的悲剧。同时，我們还必须指出：魯迅在这儿虽然只刻划了一个雇农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却有高度的典型性，可以概括各种各样的、具有阿Q精神或阿Q性格的人（其实，在我国过去的剝削階級及其政治代表身上，有更多的阿Q性格），如果認為阿Q这个人物只是体现了我国过去尚未觉醒的被压迫人民的落后精神，那显然是不能充分說明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的。

在从1924年2月至1925年11月的一年半多時間以內，魯迅又繼續写了“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离婚”

等等十一篇优秀的小說(都收在“彷徨”中)，可見他在这几年中的創作精力是很旺盛的。在这些小說中，魯迅通过中国妇女和知識分子的命运，深刻地接触到了当时中国的重大社会問題——反封建压迫的問題。象“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在酒楼上”中的呂緯甫，“孤独者”中的魏連受，“伤逝”中的子君，在当时中国的妇女和知識分子中都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而祥林嫂尤其是一个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勤劳、善良、質朴的农村妇女，她一生都受着封建地主的残酷剝削和奴役，受着封建道德和宗教迷信的麻醉和毒害，一生都在政权、族权、神权的鉄掌下面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后终于在极端的穷困和屈辱中悲惨地死去。魯迅怀着满腔的热情刻划了这个一生被損害和被侮辱的劳动妇女，同时也怀着无比的憎恨揭露、控訴了封建制度的腐敗和封建道德的罪恶。

除了这二十多篇小說以外，魯迅在从“五四”时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結束的七八年中間，还写了一些很杰出的杂文和散文，而杂文的成就及其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貢獻，尤其偉大。这是一种尖銳潑辣、政治性非常强烈的短論或战斗性小品，是一种能迅速地反映急剧的社会变动和阶级斗争、能給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有效工具和有力武器，魯迅自己称他这种杂文为“匕首”，为“投枪”，实在是很正确的。由于当时的环境非常黑暗，沒有絲毫言論自由，所以魯迅有时不得不用“反語”或“曲笔”，使他自己的某些文章显得隱晦曲折，不大容易理解，但只要环境允許，他就总是尽可能地写得明白通俗，以期一般讀者都能懂得他的意思。

他在这一时期中所写的杂文，主要都收在“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而贯穿着这些杂文的，则是他那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这些杂文的战斗作用和意义，中国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瞿秋白曾有很高的评价。为了战胜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和一切革命的敌人，为了能够经受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考验，鲁迅不但号召青年要进行坚决勇敢的斗争，而且积极提倡韧性的战斗策略，反对对敌人纵容姑息，妥协调和，反对“赤膊上阵”式的战法，主张要灵活运用“壕堑战”和“游击战”的战术；这种思想在他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其他几篇也很脍炙人口的杂文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和透彻，即在目前来看，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战斗意义。

至于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散文或散文诗，则大都收集在“野草”和“朝华夕拾”中，间或也散见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几个杂文集中。收在“野草”中的散文，大都是寓意深刻，文字也很精炼优美的抒情小品，因而一般人都称之为散文诗。其中的有些作品，固然流露着不少孤寂和失望的心情（这是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几省的特别黑暗，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和心情的苦闷——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鲁迅这时仍然是一个进化论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还看不清楚。这种阴暗的思想情绪，也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某些小说中看到），可是却也有些讽刺性和战斗性都很强烈的作品——“这样的战士”和“淡淡的血痕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朝华夕拾”则大半是回忆的文字，写得特别明朗朴素，流利畅达，与“野草”的风格大不相同。在这儿，有对于劳动妇女的热爱，

有对于被损害者的同情，有对于复古主义者的咒骂，有对于儿童精神虐杀者的控诉，有对于封建艺术的批判和对于民间文艺的歌颂，有对于旧社会的辛辣讽刺，有对于童年时期的痛苦回忆和对朋友导师们的热情眷恋……其中的“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二篇，尤其富于情感。此外，收在“华盖集续编”中的“纪念刘和珍君”，无疑地是一篇很动人的散文；即收在“呐喊”中的“兔和猫”和“鸭的喜剧”等，我个人也觉得与其称之为小说，毋宁称之为散文的。

总之，在从“五四”时期到1927年以前这一段时间以内，在小说、杂文、散文各方面，鲁迅都有非常辉煌的成就和杰出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但鲁迅在这时期中的成就，还不止这三方面，因为此外他还作了很多翻译介绍工作，文学遗产的研究整理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小说史略”），编辑出版工作，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等等，可见他努力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而他在这一个时期中对于封建文学和右翼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五四”以后，封建主义文化的代表是“学衡派”和“甲寅派”，右翼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是“现代评论派”。封建文学的死灰复燃虽然也阻碍着社会的前进和新文学的发展，但以“五四”以后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其危害性却远不及右翼资产阶级文学这股逆流，因为这些从“五四”运动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右翼资产阶级分子——胡适、陈西滢等，都是披了欧化的外衣，以“正人君子”或“学者名流”的面目出现的，一般人较难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容易受他们欺骗和迷惑。由于这个原因，鲁迅也使用了更大的火力来和他们

进行斗争，而这些斗争的结晶——他那些收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的杂文，则和他后期的所有杂文一样，都是可以传之久远的作品。

鲁迅一向主张文艺是有倾向性、政治性的，是需要反映现实和为改造社会服务的，他最反对所谓超阶级、超社会、超时代、超民族、抽象空虚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他从不谰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但是他也曾坚决地声明他所遵奉的是当时革命前驱者的将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或“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因此他总是极力使他自己和革命取得一致的步调；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和他一同前进。为了这个目的，他不但曾经参加了“新青年”的活动，而且以后还曾积极地支持和领导了语丝社、莽原社和未名社等文学团体，培养了很多新的文艺界的战士。

可是鲁迅在1927年以后到1936年为止的十年中间，却比1927年以前的那一个时期以内的成就和贡献还要伟大和重要得多。在这一时期以内，鲁迅由于痛苦的经验和血的教训，由于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科学文艺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由于党的影响和领导，由于不断的自我解剖和严格的自我改造，他已由进化论者变成阶级论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由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变成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因而他的感觉更敏锐，观察更深刻，分析更正确，批判也更其尖锐而有力了。他在这时期中所写的杂文和散文都可以说已达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水平的高度。

鲁迅在这最后的十年中，杂文的产量最多，仅仅收集成册的就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

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等，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這十年，是中國革命最艱苦的時期，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加緊，蔣介石國民黨對外國投靠和對內鎮壓革命運動的反動統治也變本加厲；為了肅清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道路上維持他們自己的血腥統治，這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集團，一方面奉行了反革命的軍事“圍剿”，另一方面又奉行了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到處都實行了舉世未有的法西斯恐怖政策，因而這一時期的魯迅，主要也是把他的筆鋒指向帝國主義，指向國民黨反動集團以及那些為其幫凶幫閑的奴才——“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家”、“第三種人”、“論語派”，以及其他一些御用文人和御用學者。雖然這時他的處境是那樣的困難，艱苦，但他始終不屈不撓，勇敢堅決地對他們進行着毫不調和的鬥爭，一有機會，他就即刻給以无情的揭露、抨擊和批判，以鼓舞群眾和教育群眾，因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他終於“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除了雜文以外，魯迅在這時期中也寫散文和以神話、傳說或歷史故事為題材的小說，並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法捷耶夫的“毀滅”、果戈里的“死魂靈”等等世界名著，提倡了新興木刻和民間藝術，介紹了外國（主要是蘇聯和德國）的版畫，積極支持了大眾語運動和拉丁化運動，提出了很多有關文字改革的正確的意見……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他在这个時期中的一些實際活動——他曾經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互濟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民權

保障同盟，并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在1931年2月間，五个优秀的青年左翼作家（都是“左联”成員）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鲁迅自己的处境虽然也十分危險，时刻都有被捕和失去自由的可能，但他还是再接再厉地进行着斗争，他曾經几乎同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这么两篇著名的文章，公开向国民党劊子手提出严正的抗議和悲憤的控訴。他在这两篇文章中很正确地提出：国民党的残酷压迫和屠杀，左翼作家的无辜牺牲和流血，事实上是証明了统治者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必然胜利，証明了“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他那篇写于1933年8月間的“为了忘却的紀念”，更是一篇异常杰出的散文。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散文里，鲁迅万分悲憤地悼念着这五位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并且深信将来总会有再記起他們的时候。可見鲁迅对反动统治者的憎恨是多么深沉，对革命前途的信念又是多么坚定！

毛澤东同志說：“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新民主主义論”）可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反动宣傳，在“五四”时期以及以后一段時間里，鲁迅对于苏联是不够了解的，但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他却逐漸明白了苏联的情形，而且觉得自己因此增加了很多战斗的勇气。他自己就曾在“答国际文学社問”中說过这样的话：“先前，旧社会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

社会的創造者是无产階級，但因为資本主义各国的反共宣傳，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現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階級社会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气了。……”（見“且介亭雜文”）这个答問是1934年写的，这时的魯迅，已是一个很卓越的党外馬克思主义者，因而对于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意义，自然比过去有了更清楚、更明确的認識。他曾以无比的热情拥护苏联的和平政策，歌頌苏联革命的胜利和建設的成功，深切地痛恨帝国主义对于苏联的造謠和誣蔑，这是只要看看他那两篇著名的、充分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文章——“我們不再受騙了”和“祝中俄文字之交”（均見“南腔北調集”）就可以知道的。而他这种热爱苏联的态度，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艺界和一般的革命知識分子，使他們認識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苏宣傳是多么恶毒和无耻。

1936年春天，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漲和国内階級关系的变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宣布解散，以便团结一切文艺界的爱国力量，組織广泛的文艺界統一战綫。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魯迅在开始时虽然对于这个问题認識有些模糊，可是，很快地他就認清了这个問題，并表示了拥护这一运动的态度，表示完全贊成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政策和主張，并且表示要无条件地加入文艺界的抗日統一战綫，因为他認為他“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托洛茨基派的挑撥离間，他曾毫不犹豫地給以无情的揭露和回击，他指出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事实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內奸和奴

仆，只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欢迎他們那种反苏反共的謬論和濫調，指出他們攻击抗日統一战綫的罪行，“有背于中国人現在为人的道德”（見“且介亭雜文末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可惜由于长期奋斗，积劳成疾，魯迅终于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不及看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战争的結束，更不及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上取得偉大的胜利和巨大的成就，不及看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一政策的实施，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的迅速成长 and 社会主义文艺的欣欣向荣。

从以上的簡單介紹中，我們已可看到魯迅在現代中国文学史和現代中国思想斗争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巨大的，因为，我在前面已經說过，不論在小說方面、散文方面、雜文方面、翻譯介紹方面、民族遺產的整理研究方面，思想斗争和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他都有輝煌的、杰出的成就和貢獻；他所有的譯著，都是中国文学中最寶貴的財產。中国人民，特別是文学工作者和青年們，将很好地研究和繼承这份寶貴的文学遺產，从它們中間，永远吸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同时，魯迅的作品，毫無疑問地也是一份世界文学中的寶貴財產，凡是爱好和平創造和文学事业的人們，也都将永远重視这一份寶貴的精神財產。魯迅所以这样偉大，所以有这样杰出的成就和貢獻，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的一生确实是战斗的一生——由于他本人就是战斗的化身。他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离开战斗来观察魯迅的生平事业，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他在現代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所居的重要地位。

他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几十年的悠长时间以内，在最困难最艰苦的环境中，他一直都在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即使由于客观条件和他本身主观条件(主要是世界观)的限制，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也曾经有过彷徨和苦闷，但这时的彷徨和苦闷，却并没有使他放弃英勇的、顽强的战斗。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可是，这一统一战线却很快地就化裂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然不必说，就是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不久就动摇、脱离、以至背叛了这一革命运动，投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中去；而鲁迅则始终坚持着斗争，始终坚持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艺阵地。毛泽东同志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和主将，说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认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对于这样的评价，鲁迅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

正如前面所说，鲁迅一生所走的道路，是很复杂曲折的，也是异常困难艰苦的。在长期的奋斗中，他不但常常地解剖别人，而且也常常地解剖他自己，随时克服他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他认为革命文学家“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认为如果是“翻着